

男女平等:一个多维的理论建构

叶文振

摘 要:本文分别利用一个多维的框架展示男女平等的内涵和解释男女平等的主要决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对我国男女平等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因素是对外的开放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意识、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和政府的性别政策。

关键词:男女平等;国策;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4)04-0098-06

作为重要国策提出来的男女平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实际上她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重要理论,要动员全社会一起来贯彻男女平等国策,首先要把男女平等当作一个理论来认真学习和深入理解。正如彭佩云同志所指出的一样,男女平等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核心问题(彭佩云,2003)。本文首先简单描述人们在认识男女平等时存在的偏差,接着分别利用一个多维的框架展示男女平等的内涵和解释男女平等的主要决定因素,最后我们将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谋求男女平等的几个重要对策。

一、男女平等的认知偏差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各级妇联在研究、宣传和落实男女平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人们在认识和宣传男女平等时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偏差:一是用简单的性别平均替代男女平等,持这种看法的同志往往把男女平等看成是性别对等,即两性平分秋色,各占百分五十,男女平等的目标就是让妇女撑起“半边天”,其实从男女各自的生存和发展的性别优势来看,女性的份额低于百分五十不一定就意味着男女不平等,而高于百分五十就一定实现了男女平等。

二是偏重结果的男女平等,忘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是过程与结果的双重的性别平等,如果女性因为性别属性而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或代价才能实现最终的性别平起平坐,这种的结果平等仍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男女平等。例如,在对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尽管与用人单位初次的签约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相对于男同学,却有更多的女大学毕业生是能岗、能酬不一致的就低进入劳动市场(叶文振等,2002),这种潜在于过程中的或者被体现结果的数据掩盖的男女不平等正是我们要全力以赴去克服的。又如,我们还不能用通过组织的硬性比例规定而增加的女性参政机会来说明政治上的男女平等程度。

三是过于强调权力资源的性别平等,似乎政治权力的性别平分就能全面实现男女平等。实际上政治的男女平等只是男女平等的一个侧面,是一个还是比较表层的男女平等。真正的深层的男

作者简介:叶文振,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女平等应该体现在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层面上,也就是要形成一种文化氛围和制度架构,没有男女平等文化和制度的基础支撑,其它方面的性别平等就可能是暂时的,或者仍然是由男权文化和制度建构出来的。

四是用单性别的视野看待性别平等,不少人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影响日趋明显,一方面片面地强调男性对男女不平等社会事实形成和继续存在的性别责任,另一方面把男女平等更多地看成是女性单一性别的历史重任,忽视了男女关系从不平等到最后平等都离不开性别互动,没有两性之间的彼此谅解尊重、互相合作努力,要实现男女平等是很难的,即使男女趋于平等,其关系也是不和谐的。

以上对男女平等认识偏差的描述提醒我们,把男女平等当作一个理论来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很迫切的,不系统地了解男女平等的理论内涵,不深入地探讨影响男女平等的重要因素,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对待性别平等,也不能有效地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国策。

二、男女平等的统计测量

男女平等这一概念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或者说是一个具有多个侧面或维度的概念,这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早在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性别平等就被界定为“男女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这种具有多元性质的男女平等在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又得到更为具体的阐述,即“人人都有平等机会享受自己的权利,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以便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而且平等地享受其成果。对妇女来说,平等意味着实现某些由于文化、体制、行为和态度方面的歧视而被剥夺的权利”(黄智君,2003)。我国学者也认为,男女平等是两性个体在人格上的平等,在两性关系和家庭生活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在社会生活中机会、竞争和选择的平等,以及在法律上的平等(闵家胤,1995)。在全国妇联最近召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女平等理论研讨会”上,参会学者继续探讨男女平等的内涵,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仍然是一种多元化的理解,即男女平等不仅是权利的平等,如占有资源方面的权利均等,机会的平等,如交易机会、占有和使用资源机会的平等,而且还是人格、价值和尊严的平等(课题组,2004)。

但是,我们对男女平等内涵的理解和认识至少还要从两个方面去深化,一是我们是否涵盖了男女平等的各个侧面,换句话说,我们是否系统地反映了男女平等的丰富内涵。我们认为,理论界到目前为止对男女平等的内涵理解或统计估算都只是针对已经出生的人口,并没有看到我国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现实,也就是不少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对新生孩子产前的性别选择,导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82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5,然后持续上升到1987年的110.9、1990年的111.3、1995年的115.6和2000年的116.9,明显超过国际上公认的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即介于103-107之间(张翼,2002)。从当年溺女婴到今天使用超声波技术进行产前的性别鉴定和流产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看似简单的出生性别比实际上可以从许多侧面说明我国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如果我们不能把这种最初始的男女出生的平等或男女的生命平等纳入我们对男女平等的理解范围,那么现有人口的性别平等都是有缺陷的或者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们建议从生命周期理论的视野来审视男女平等,也就是从一个女性的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历程来理解男女平等的内涵。

二是我们是否把对男女平等内涵的理论认识化解为能够具体测量的统计指标,没有这一步的跨越,我们对男女平等内涵的理解都只能局限在定性的讨论上,不能实现向定量分析的转化,最后我们也不能真正地估算出男女平等的程度,并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地区进行纵向比较或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横向对比,特别是利用统计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对男女平等实现的不同程度展开更为科

学的解释分析,或者对男女平等的相关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男女平等至少是包括五个方面的性别平等,与此相对应的是用多个指标建构而成的对男女平等的复合测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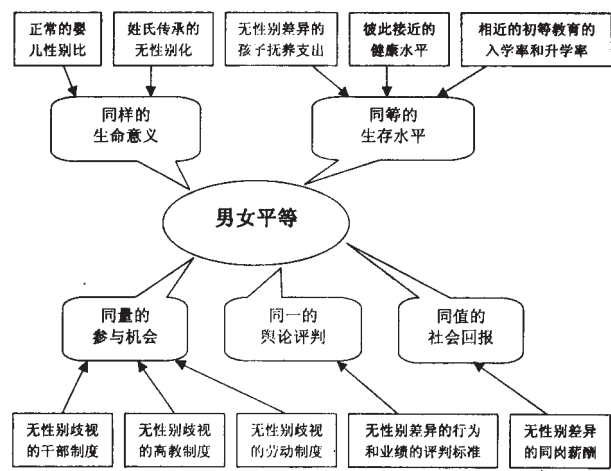


图1 男女平等的内涵

1.同样的生命意义

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用性别来对一个生命进行人为的取舍;进一步说,如果生命的意义是用存活着的一个人的社会功能来表示的话,那么他(她)是否对社会拥有效用或功能主要不是取决于性别,而是归结于他(她)的个人能力和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女孩子不拥有传宗接代的效用是不合理的,不论是她的生育实践,还是生育后对孩子的哺育和家教服务,她都对家族的繁衍和社会的延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有资格让孩子传承她的姓氏。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我国女性在幼年的时候,以她的天真可爱润滑着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对稳定父母亲之间的婚姻关系尤其重要;在成年之后,她还以自己不断扩大的“反哺式”的家庭养老和助老作用使不少步入老年的父母发出“生女儿真好”的感叹,促使社会上只有“养儿”才能养老防老的传统意识日趋弱化(叶文振,1998)。所以,正常的婴儿性别比和姓氏传承的无性别化或女性化应该是男女平等最为重要的测量指标。

2.同等的生存水平

这主要体现在用统一的社会抚养标准抚养我们的所有孩子,不应该存在性别差异,即使在家庭资源不足的约束下,也不能采取“弃女保男”的性别倾斜做法,如饱男饿女,有病时医男不医女,女儿退学打工资助儿子上学等等。其实,一些调查研究的结果都不同程度地发现,我国特别是农村在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方面仍然表现为男高女低的性别特点(朱楚珠、张友干,1996;李树茁、朱楚珠,2001),影响女性形成与男性一样的人力资本含量和市场竞争能力。针对我国这一社会现实,我们应该把对孩子成长过程中平等的人力资本投入当着一个基本的性别平等,以确保我们的孩子都形成必备的社会参与与自身发展的资格和能力。与此相对应的,男孩女孩的无性别差异的孩子抚养支出、彼此接近的健康水平以及相近的初等教育的入学率和升学率都可以作为男女平等的测度变量。

3.同量的参与机会

通过同等的生存水平所形成的社会参与和个人发展能力还需要有机会得到发挥,给与同等的参与机会对于成年女性的发展至关重要(叶文振等,2002)。因此,男女平等还必须表现为,对所有

向社会和市场提供服务、展示能力以及进一步发展自我的机遇,如研究生学位的攻读、高等教育后的就业和在政治权力阶梯上的升迁等,都要向两性全面开放,不能存在性别偏好,并实施性别封锁和封闭;与此同时,还要推行公平竞争的原则,在录取或录用时杜绝使用含有性别歧视的双重衡量标准;在社会分工和岗位配置中,切实推行按能力、兴趣分工和配岗,而不是传统的性别分工。为了充分体现机会均等在男女平等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在测量男女平等时,也要把相关的指标,特别是是否建立起无性别歧视的高教制度和劳动制度,以及是否消除干部制度中存在的显现和潜在的性别歧视纳入考虑的范围。

4.同值的社会回报

合理的劳动报酬既保证女性对自己已经形成的人力资本的再充值,又激励更多的女性走向社会参与竞争。和按能力分工一样,我们也要按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和工作贡献来确定相对应的工资报酬,建立性别公平的薪酬制度,防止利用外部的就业压力任意压低对女性员工的薪酬。另外,不少研究还发现,我国还存在着女性因为性别属性而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或代价才能实现最终的性别发展的现象,如职业女性因为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而出现更多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问题,又如高学历女性的适时成婚或者维持婚姻稳定的艰难(叶文振、林肇国,1998),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者抵消我国女性从发展中所得到的社会对她们的回报。因此,无性别差异的同岗薪酬或者无性别代价的女性发展也是男女平等的一个测量指标。

5.同一的舆论评判

长期以来,我们对生活方式的创新和职业生涯的发展的评析总是男女有别,基于性别的双重评判标准,导致了同样的行为方式、同样的职务升迁截然不同的社会评价和舆论猜测,例如把已婚男性的“小秘”行为看成是人生成功的标志,而对女性的婚外恋依然给予传统的指责;把男性的职业发展更多地归结为他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把女性的职位升迁更多地与某位男性权势的亲密关系联结在一起,结果在纵容男性在不良的生活方式变迁中越走越远、夸大个人能力对男性职业发展的贡献的同时,又给许多女性增加了不必要的心理压力、行为限制甚至形象和人格的双重歪曲,妨碍了她们对一些不合理的传统生活方式所进行的富有时代意义的勇敢变革,干扰了女性个人能力与职业发展的正常互动。与前面四种比较显现、直观的男女平等的侧面相比,这是一个潜在的、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维度,是体现人格的互相尊重、名誉的彼此爱护的一种男女平等。鉴于同样的舆论评判是反映深层次的男女平等,我们也要把无性别差异的行为和业绩的评判标准列入多元的测量指标体系中去。

三、男女平等的影响因素

学术界对我国男女平等的影响因素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根据一些学者的综述,这些探讨大概已形成以下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课题组,2004):一是“生产力决定论”,认为生产力发展会铺平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二是“文化决定论”,认为男女不平等主要归因于社会文化对两性的不同规范和角色界定;三是“素质决定论”,认为是妇女偏低的整体素质制约她们与男性的同步发展;四是“生理决定论”,认为男女不平等主要来源于遗传和解剖学上的性别差异。除“生理决定论”明显站不脚以外,其他观点虽然都有些偏废或者只侧重于某个影响因素,但从另一方面又说明,不论是在哪一个社会或国家,男女平等的水平实际上是许多相关因素共同影响的综合结果,建立一个多元的理论分析框架要比选用单一的影响因素更具有解释力,也更符合实际情况。从我国特殊的国情来看,对男女平等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对外的开放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意识、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和政府的性别政策(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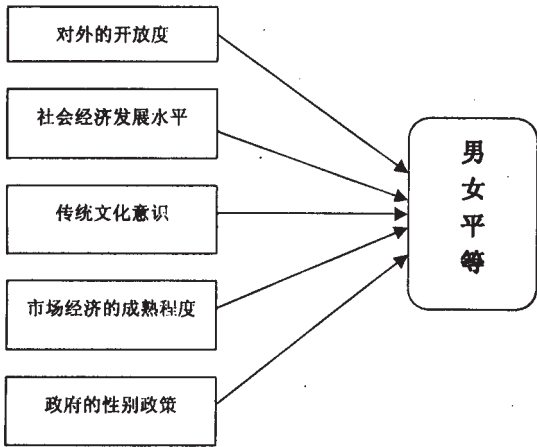


图 2 男女平等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1.对外的开放程度

一个全面对外开放,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全方位、经常性的接触和交流的国家常常会通过对国际性别平等组织活动的参与,以及签定国际性别平等协议,主动地接受国际社会对本国男女平等贯彻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并在国际比较中发现问题、寻找差距和学习经验,进而能够更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改善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提高男女平等的水平。另外,西方先进的性别文化也会通过对外开放得以引进和扩散,这对于缩小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改变女性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环境将发挥越来越明显的积极作用。最后,对外开放还架设一座学术桥梁,不仅为国内的性别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和经费,而且还促进国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带动我国男女平等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为男女平等的公共宣传和政府决策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因此,提高我国对外的开放度将十分有利于男女平等相处和共同发展。

2.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由人均GDP水平、城市化程度、产业结构、义务教育投入等指标反映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或现代化水平与男女平等密切相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水平和城市化程度越高,第三产业在所有产业中的比重越大,公共教育的投入越多,男女平等越具有较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其平等程度也会越高。城市化会营造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性别文化和制度环境,给女性更多的选择机会和自由空间;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有利于发挥女性就业的性别优势,增强进入劳动市场和谋取职业发展的竞争力;公共教育的普及和强化势必加大女性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拓宽女性的职业发展领域。当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男女平等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非线性的,但是,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二者之间一定会呈现出一个线性的正相关关系。

3.传统文化意识

许多研究表明,传统文化观念是男女平等难以实现的最深层原因,因为它不仅是男权统治和资源配置向男性倾斜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内化为不少女性的自我性别约束和对男女不平等社会安排的默许和认可(叶文振等,2003)。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男婚女嫁的婚姻制度、“男尊女卑”和“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意识、以及用整体的性别差异评估个体女性能力的统计性偏见等制度性和观念性的传统文化都和男女平等呈反向相关,制约着男女平等国策的落实。

4.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

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会形成一个公平、文明竞争和能岗匹配、能酬对应的自我运行机制,它在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在讲究经济效率的运营中,会主动地淡化性别意

识,取而代之的是能力意识和经验意识,有能力和经验的女性也就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摆脱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脱颖而出,而她们成功的职业示范,又进一步改变劳动市场进而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历史偏见。因此,市场经济的继续发展将有助于男女平等特别是劳动就业方面的性别平等。

5. 政府的性别政策

男女平等还依赖于政府行政上的直接干预和推动,象我国提出男女平等的国策,并写进好几个法律文本中去,还有设立直接负责男女平等推进工作的妇联及其它机构和组织,以及配合国际相关组织,结合“三八”国际妇女节等重要节日,大力进行男女平等的国策宣传,特别是在深入的男女平等现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联合各有关单位还有社会力量,认真处理性别平等化过程中出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男女平等关系的建构。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各影响因素不仅直接作用于男女平等,而且还通过其他影响因素间接地与男女平等发生因果关系。例如对外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性别政策都可能削弱传统的性别文化意识,间接地推进男女平等。相反,传统文化意识也可能影响政府的性别决策,扩大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消极作用,进而减缓男女平等的进程。这说明,我们还必须深入了解各决定因素对男女平等的影响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估计每个因素对男女平等的影响程度。

四、男女平等的对策建议

本文分别利用一个多维的框架展示男女平等的内涵和解释男女平等的主要决定因素。虽然我们的分析主要局限在定性的层面上,还有待于以后的实证检验,但是其理论意义还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我们进一步充实了前人对男女平等内涵的理解,特别是把同样的生命意义也纳入性别平等的范畴。其次,我们还提出一系列与男女平等各个纬度相对应的测量指标,为今后男女平等的统计测度做了必要的技术准备。最后,我们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构解释男女平等的多元理论模型。

从影响因素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要在我国加快推进男女平等,其主要对策是:1.要坚持改革开放;2.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3.努力把男女平等国策的贯彻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推进男女平等,反过来又通过性别平等和积极互动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4.要借助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一方面用男女平等和谐的先进文化取代传统的性别意识,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行政作用,加大政府在推进男女平等方面的作为,把各级政府都办成一个现代性别意识强、模范执行男女平等国策、善于协调性别关系以及充分调动两性潜能和积极性的无性别倾向的文明政府。

参考文献:

黄智君:《评价性别平等的标准及存在的问题》,《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6期。

李树茁、朱楚珠:《中国儿童生存性别差异的研究和实践》,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版。

彭佩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女平等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12月3日。

闵家胤:《“男女平等”并没有错》,《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1期。

解振明:《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人口研究》2002年第5期。

叶文振:《孩子需求论: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叶文振、林肇国:《我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原因和对策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

叶文振等:《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人口学刊》2003年第5期。

叶文振等:《女大学生的“同民同工”》,《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6期。

张翼:《我国婴儿出生性别比在持续上升》,中国网,2002年12月23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课题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女平等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1期。

朱楚珠、张友干:《中国咸阳部分农村孩子成本与效益研究》,《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3期。